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三大经济学巨著之一

货币通论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原著

(全译典藏图本)

董丽娟 于淑霞 等译

1111Xin

人民日報出版社

货币通论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原著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三大经济学巨著之一

董丽娟 于淑霞 等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货币通论 /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原著,
董丽娟等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208-834 -4

I. 货… II. 董… III. 凯恩斯主义 IV. F091.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1351 号

书 名: 货币通论

出版人: 董 伟

原 著: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原著

译 者: 董丽娟 于淑霞 汪明丽 姜志臣

责任编辑: 许南方 朱 岩

封面设计: 日日新文化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长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520 千

印 张: 25.25

印 数: 10 000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8-834 -4

定 价: 65.00 元

编译者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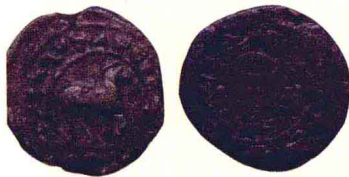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生于英国剑桥,早年求学于剑桥大学,其经济学导师乃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创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凯恩斯既精于学术,也热衷于政治,其影响力甚至辐射到美洲,罗斯福便是其理论的虔诚实践者。上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几乎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崩溃,现有的任何经济理论都无能为力。1933年,罗斯福开始推行“新政”,但半年未见成效。凯恩斯致信罗斯福说:“美国经济之所以复苏受挫,是由于白宫没有增加新的借款。今后六个月,经济形势能否好转取决于您是否为更大的政府支出铺平道路。”看来,要扭转危如累卵的经济形势就必须为其注射强心剂——全新而系统的经济理论。

1936年2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货币通论》)问世,风雨飘摇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终于盼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而凯恩斯本人也由此登顶学术巅峰。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源泉,《货币通论》产生于人们挽救“经济学危机”的关键时期,被称为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在本书最后一章写道:“我对古典理论的批评并非因其逻辑错误,而是它默认的假定从来没有被满足过,它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经济问题,而且现代古典理论本身已经注意到经济力量的自由博弈需要一定的控制和指导。”凯恩斯阐述的理论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替代传统经济理论的“无形之手”,这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精髓所在。

《货币通论》阐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的失衡。凯恩斯认为:经济萧条时期,社会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实现充分就业,个人消费需求也不足以启动复苏,私人投资需求只有在政府投资活跃了市场以后才会增加;政府必须强化对经济的干预,并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即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财政赤字,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简单地说,经济复苏就是依靠政府借款或印钞票来扩大支出,从而刺激总需求。这不仅是凯恩斯撰写《货币通论》的主旨,也是解决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经济问题的最佳办法。

《货币通论》不仅开启了现代宏观经济研究的新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它是经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所达到的高度至今无人企及。凯恩斯对自己的评价也毫不隐晦,他在序言中写道:“本书主要是为经济学家而写,我希望其他人也能看懂。”由此可见其所及之高度。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可以与亚当·斯密相媲美,如果说亚当·斯密是一位伟大的开创者,凯恩斯则是一位不朽的终结者,他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如同爱因斯坦之于物理学。不过,凯恩斯并没有彻底推翻旧经济体系,而是对处于绝望时刻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以补救。自亚当·斯密以来,对市场经济最大的挑战已被抛到身后,凯恩斯成为资本主义的救星。

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因心脏病逝世。《泰晤士报》在讣告中写道:“他是一位天才,作为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他对专业人士和一般群众的思想都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要想找出一位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



原版序

本书主要是为经济学家而写，但我希望其他人也能看懂。本书旨在讨论一些理论存在的质疑，至于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际尚在其次。如果正统经济学存在错误，其根源并不在理论架构上，而在其前提不够清楚和缺乏普适性上，因为其理论架构本身的逻辑严密，很少有可非议之处。因此，除非通过高度抽象的论证和大量的辩论，否则无法达到我的目的，即说服经济学家们批判地重新审视他们那些基本假设的可靠性。我本不希望有太多的论证和争辩，但又觉得这非常重要，它不仅有利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有利于体现这些观点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主流理论。我断言，那些笃信“经典理论”之人会认为我犯了极端的错误，而且还毫无新意，孰是孰非只能留待他人评判了。文中辩论性的部分旨在为辩驳提供某些基本素材，若因苛求不同而言辞过激的话，恳请予以谅解。我本人多年来也曾诚服于我现在所要反对的这些理论，我想我不至于忽视其优点。

我们所争执的对象其重要性无以复加。不过，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则我先说服同行的经济学家，然后再及群众。现阶段，我们只能欢迎群众旁听，但他们只能作为旁听，把经济学家之间的意见分歧点明即可。因为这些意见分歧极有可能使经济理论丧失实际重要性；意见分歧一日不去，实际重要性便一日不恢复。

恐怕没人比我更清楚本书与我五年前出版的《货币论》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这只是历年孜孜以求的思想自然过渡，而读者却会觉得是观点上的改变，迷离而无所适从。即使我刻意在术语方面作一定的调整，仍然不能减轻这一问题。我对这些表达上的变更在后续的行文都予以了提示；二者之间的关联可简述如下：在我开始写作《货币论》时，我依然遵循传统，将货币视为供求通论以外的一种力量。完成该书时，我已倾向于将货币理论推行为社会总产量论，以便形成一套总产出理论。但是，由于自己尚未从前人固有的观念中解脱出来，所以未能就产出水平变动引起的后果予以透彻的讨论。现在看来，这是本书（第三、四卷）理论部分之显著缺陷。那些所谓的“基本等式”是在假设产出量既定前提下的一种静态表现，意在说明既定产出量下一系列因素引起利润的失衡，继而迫使产出水平发生改变。然而，对于与静态表现完全不同的动态发展却未予理会，表达模糊。本书则不然，我首先着手研究那些决定总产出规模和总就业变动的因素，当我了解到货币是以一种基本和特殊的方式参与经济事务后，货币的技术细节就变得不重要了。我们发现，货币经济的特征就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数量。

当前经济行为虽常受人们对未来看法的影响，而且看法又常在改变，但我

们分析当前经济行为的方法仍不外乎供求关系的交互反应。如此，我们的分析法与价值论便有效地衔接起来了，于是便达成一个通论：我们所熟悉的经典学派理论只是通论的一个特例而已。

要著成此类书籍，作者须另辟蹊径。此外，为使错误不致太多，作者尚需接纳他人的批评与讨论。因为，如果一个人单独构思太久，他可能对自己的想法暂时深信不疑，这是极其可笑的事情。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皆是如此，我们往往不能以一己思想，用逻辑或实验的方法作决定。

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受益于卡恩（R.F.Kahn）先生的指导，较之五年前的《货币论》或犹过之，书中多处都是根据他的建议而改定的。此外，本书还承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郝特雷（R.G.Hawtrey）先生及哈罗德（R.F.Harrod）先生校阅。

写作本书的过程是我思想的一种蜕变，也是长时间的自我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如果作者的努力不虚，则大部分读者读此书时必有同感。书中思想虽然表达方式甚为复杂，其实异常简单，应当为人所共知。这之所以困难，实不在于新，而在于要从传统观念中摆脱出来，对于大多数从传统观念下熏陶出来的人而言，旧观念已根植于每一角落。所以，我认为困难并不莅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于伦敦

导读

1935年1月1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写给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年）的信中说：“……我相信自己正在撰写一部将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产生革命性影响的经济理论著作。”1936年2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货币通论》）在英国公开出版，并迅速传到美国。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年，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后来描述：“自1936年后，人们仍在白天讲授旧经济学，但到晚上，哈佛圈中的所有人都在谈论凯恩斯。”

《货币通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完成了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新经济理论体系的过渡，也标志着凯恩斯学说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使得“凯恩斯主义”成为20世纪西方经济思潮中最大的一个流派。但《货币通论》问世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开启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时代，更为重要的是，以它为理论支撑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大萧条的痛苦中拯救了出来。因此，站在历史的高度，凯恩斯的地位可以与亚当·斯密相媲美。有人曾把凯恩斯的理论誉为是一场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凯恩斯主义”也深化成“凯恩斯革命”。不过，凯恩斯主义并不是对旧经济思想体系的彻底推翻，而是对其极力保全，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绝望时刻的补救办法。直至今日，连最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是凯恩斯主义使集权主义在发达国家中的前进步伐停滞了，自亚当·斯密以来对市场经济最大的挑战已经被甩到了身后，凯恩斯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救星。

一、凯恩斯生平

1883年6月5日，凯恩斯出生于英国剑桥，父亲尼维尔·凯恩斯是剑桥大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讲师，母亲弗洛朗斯·阿达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革先驱，她曾担任过剑桥市议员和市长。儿时的凯恩斯被认为是神童，他14岁考取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主修数学，19岁进入剑桥大学主攻数学。在大学期间，凯恩斯继续展现其过人的才华，他不仅获得了学业上的成功，而且还热衷辩论和社团活动，这为他日后成为能言善辩的国务活动家和文笔最优美的经济学家奠定了基础。

因希望步入政坛，1905年凯恩斯获得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继续留在剑桥并师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研习经济学，以应对进入政坛所必须的文官考核。此后，凯恩斯迅速显现出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天赋，马歇尔在致老凯恩斯的信

中说：“您儿子的经济学成绩优异。我已告诉他：如果他决意以经济学家为终生职业，则我不胜欣喜之至。”然而，此时的凯恩斯一心从政，而不是成为职业经济学家。在1906年英国的文官考试中，凯恩斯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用。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经济学却得了最低分，他很不满地直言道：“主考人所懂得的经济学大概还不及我”。吊诡的是，此次考试的第一名奥托·尼迈耶（Otto Niemeyer）入选财政部，并成为英国财政部经济思路的主要设计者，而他正是凯恩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直攻击的对象。

通过文官考试后，凯恩斯被派往印度事务部工作，这段工作经历让他学会了从学者和行政官员的两种视角看待经济问题。但平淡无奇的公务员生活让凯恩斯颇为失望，他把大量时间用来撰写博士论文，该论文成为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一书，该书体现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和高超的逻辑演绎能力。同时，凯恩斯对印度的货币制度也产生了兴趣，根据这段工作经历与思考，他于1913年出版了《印度通货与财政》，驳斥当时流行的金本位制，提出完善印度货币制度的措施。约瑟夫·熊彼特称赞该书为“最好的有关金汇兑本位制的英文著作”。这是他撰写的第一部著作，但该书并未引起轰动效应。同年，英国官方组织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研究印度通货问题，凯恩斯被聘为该委员会的成员。

1908年，凯恩斯应马歇尔之邀，返回剑桥大学任教，并由此步入职业经济学家的道路。1909年，凯恩斯创立了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同年因其最初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而获“亚当·斯密奖”。1911年，在马歇尔的力荐下，凯恩斯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专业刊物——《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这一职位一直保持到1945年。通过这个平台，凯恩斯大大提高了他在国内外经济学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尽管走的是职业经济学家道路，但凯恩斯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正如凯恩斯的传记作者，也是凯恩斯在经济学杂志社的同事奥斯汀·罗宾逊（Austin Robinson）在《凯恩斯传》中评价的那样，“对所有人来说，凯恩斯固然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完人，但相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兴趣是广泛的，他具有超群的天赋，在众多的学科领域里都具有高深的造诣，使内行人都引以为知音而对他十分推崇。他能够在相等的知识和理解水平上，同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藏书家、现代油画评论家、芭蕾舞评论家等谈论问题，正如他能同经济学家、金融家、文职人员和政治家纵谈古今一样。”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宣称，凯恩斯拥有他所知道的“最敏捷和最清晰”的智力，“当我与他争论时，我感到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等我醒过神来时常常感觉自己有多么愚蠢。”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外，他积极参与政治、商业活动，充分发挥他的演讲、写作和社会活动能力，努力扩大自己学术思想的影响力，力求使其成为现实政策。

凯恩斯与原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莉迪娅·洛波卡娃结婚后，曾专门为其开办了一家歌剧院。在1921至1938年任“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National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董事长期间，凯恩斯对股东的年度报告被金融界人士视为必读的内容。他还精于投机，并为自己和所在的剑桥大学赚得了大量财富。其

股票选择的原则至今仍为人所乐道，1930年至1936年底，在美国股市增长两倍而英国股市变化微弱的这段时期，他的资产净值升值了23倍。1946年去世时，凯恩斯已成为当时最富有的经济学家，其资产收益率远超过同时代大多数专业货币经营者。

在政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当时社会上普遍担心会出现金融危机。作为货币问题专家，凯恩斯参与英国战时金融事务的筹划和协调，并于1915年被调往英国财政部，担任财政部顾问和英格兰银行领事。由于凯恩斯的正确建议，迫在眉睫的经济恐慌得以缓解。1919年，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由于《凡尔赛和约》要求的战争赔款远远超出德国的力量所及，且对德国工业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凯恩斯认为赔款既不会得到全部支付，也不会使和平得到保障。这一观点后来被证明十分有先见之明。今天的历史学家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混乱为纳粹的崛起播下了种子。由于强烈反对《凡尔赛和约》未果，和谈结束后，凯恩斯从财政部辞职，复归剑桥。同年12月，凯恩斯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严厉批判《凡尔赛和约》，主张适度索赔和取消战争债务，以尽快稳定欧洲经济。该书当时被誉为“自停战以来最有影响的出版物”，凯恩斯也得以在大西洋两岸一夜成名，成为欧洲复兴的中心人物。1929至1933年大萧条期间，凯恩斯主持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工作。1940年凯恩斯出任英国财政部顾问，参与战时各项财政金融问题的决策，在他的倡议下，英国政府开始编制并统计国民收入，使国家经济政策的拟订有了必要的工具。由于其对英国的贡献，1942年5月，凯恩斯被英国女王赐封为提尔顿勋爵；在60岁生日时，凯恩斯被授予剑桥大执事这一荣誉职务。

二战后期，凯恩斯致力于避免30年代的经济灾难在战后重现，积极筹划创建国际合作机构；并为了英国经济在战后走出困境，而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1944年，盟军再次击溃德国，战争给所有各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成为天文数字。这次，凯恩斯不再是一个失意的旁观者。1944年7月，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了由44个国家的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货币问题会议，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那里，凯恩斯成为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推动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立使国际金融体系恢复了稳定，使被战争摧毁的国家获得了贷款，使欧洲的重建得以保证，凯恩斯也因此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

1946年3月，凯恩斯出任世界银行首任总裁。4月21日，凯恩斯因心脏病逝世于索塞克斯（Sussex），享年63岁。英国《泰晤士报》为其撰写的讣告说：“他是一位天才，而作为一位政治经济学者，他对专业人士和一般群众的思想都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要想找出一位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

二、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演变

从某种程度上说，凯恩斯的经济学学术历程是一个对抗经济危机的过程；而正是在面临经济萧条、寻找对策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并与传统经济学明显分野，开创了经济学的新正统。

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主宰人们思想的正统经济学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信奉萨伊定律（Say's Law），相信市场能够自我实现充分就业，即便存在失业也只是暂时的，因为价格和工资可以灵活变动，提供了一种自我矫正机制，从而能够迅速恢复充分就业，而无须政府的干预。而且传统理论认为，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储蓄总是会自动转化为投资，当国内经济萧条时就要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鼓励多储蓄，造成利息率下降，从而刺激投资和扩大就业，使经济回到均衡点。凯恩斯早年受马歇尔和庇古（A. C. Pigou）等经济学家的熏陶，也是传统经济学观点的拥趸，他曾回忆说，“作为古典学派忠实的学生，我直到1923年都没有怀疑所接受的教诲。”从1908年返回剑桥大学到1920年期间，凯恩斯主要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货币金融学》等相关课程，所以其早期著作中充斥着市场自动调节效果的观点，1923年11月出版的《货币改革论》基本遵循了马歇尔和庇古的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分析原则，构建了一个正统的货币理论框架。在《货币通论》的前言中，凯恩斯亦提到“我本人多年来也曾诚服于我现在所要反对的这些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经济实力被严重削弱，丧失了自19世纪初就拥有的工业优势，国内经济迅速陷入萧条。而当时的财政官员深受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把失业归结为工资太高，因而认为应通过削减工资解决失业问题，同时把自由放任政策作为政府行为的最高原则。但传统经济学给出的紧缩和自由放任政策加剧了经济衰退。作为一位一直关注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把目光放在了探究经济萧条的原因和寻找相应的对策之上。1923年《货币改革论》发表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的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但没有成功。在《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一文中，凯恩斯对时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采取“平价金本位制”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10%。要弥补这样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经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正是在治疗英国的这种慢性萧条中，凯恩斯逐渐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不足和传统政策的失败，而政府具有私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在他的文章中，开始不断批判自由放任思想，而倡导国家干预经济。1924年他初步提出了以公共工程来解救经济衰退和失业的设想。同年11月，凯恩斯在牛津大学作了题为“自由放任的终结”的演讲，他所说的“自由放任”，即是指“政府不应当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的想法，他强调，救治由“风险、不确定和无知”导致的灾难需要“由一个中央机构故意控制货币和信贷，并且……收集和传播商业详情。”而在1929

年《失业的治疗措施》一文中，凯恩斯不仅否定储蓄总等于投资的传统定论，而且也否定充分就业均衡常态的传统假设，并支持扩大政府公共投资解决失业的政策。该文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触及了其理论核心。这些思想逐渐打破了传统经济理论的坚固堡垒，为《货币通论》的面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929至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和影响最广泛的经济危机，它沉重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人大量失业，社会动荡空前严重。美国前总统约翰·卡尔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1872—1933年，于1923—1929年在任）在去世前悲观地说：“在其他萧条时期，总是可以看到一些可靠的东西，你可以寄希望于它们。但当我环顾四周，我看不到任何有希望的东西，没有人还抱有任何希望。”然而，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正统经济学无法从理论上对此予以解释，在实践上更提不出任何应对之策。当已有1/4的美国劳工失业时，庇古仍然坚持：“通过完全自由的竞争，充分就业的强大趋势将始终存在。现在的失业与任何时候所存在的失业一样，完全是由于摩擦性阻力妨碍了工资和价格能迅速作出适当调整所致。”但此时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仍受传统经济学观念左右，在危机最初的几年，西方各国政府都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美国总统胡佛还乐观地提出“繁荣正在街角拐弯”的口号，认为经济繁荣的局面很快就会出现。可是危机并没有如预期中那样自动终止，传统经济学家开出的削减工资和降低利息率的处方反而进一步恶化了经济衰退形势。到1933年，西方国家的失业人口已达3000万，是1929年的五倍多。英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领袖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年）说：“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陷入了“可怜而又可笑的混乱状态”。由于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大萧条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正统地位。

正如琼·罗宾逊所说，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是设法了解这个制度，以加速其倾覆；马歇尔设法把它说得可爱，使它能为人们所接受；凯恩斯则力求找出这一制度的毛病所在，以使它不至于毁灭自己。”在严重的经济萧条和悲观情绪蔓延的背景下，凯恩斯仍坚信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患上无法治愈的“老年风湿病”，而是处于从一个经济时期向另一个经济时期转变过程中的痛苦，只要坚持靠经济手段加以治疗，资本主义经济这台机器必将重新运转起来。他反对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削减工资政策，“如果减少工资，必将减少另一部分人的购买力，”因而他认为平衡经济的工资杠杆已经失灵。而随着萧条的加深，公众的商业信心普遍动摇，市场机制完全失灵，凯恩斯也开始怀疑货币政策的功效，转而相信依靠财政政策的刺激才能解决时下的问题。1930年5月，他在《工业危机》一文中指出：“为把我们从萧条中拯救出来，需要的不仅仅是银行利率的被动变动，还应该有非常主动和坚定的政策。因为当企业信心崩溃时，实行低息信贷已很难有刺激效果，除了政府插手弥补私人企业的不足外，很难解决当前的萧条。”

凯恩斯解决失业问题的核心措施就是鼓励扩大公共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他公开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健全财政和节俭的观念，坚信不增加投资支出和消费支

出，就无法使物价上涨和摆脱萧条。在1930年3月的一次讨论中，他提出“减少储蓄，一场挥霍运动将大有裨益。”而且他特别强调，通过扩大政府在国内的投资，恢复商业信心，然后带动私人企业重新投资，等市场作用恢复后再逐渐降低政府干预的程度，他认为这些扩张性的做法才是医治衰退的真正措施。在1930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凯恩斯首次清晰地阐述了一笔支出的就业乘数效应：花200英镑购买一辆英国汽车，首先会造成汽车工业部门的就业，当该部门的工人将收入花费掉之后，又会造成提供汽车的部门和行业的就业。如果利用闲置资源造成利润增加，则企业还能为政府提供新增税收，再加上就业扩大会减少政府的失业救济支出，从而带来的总产出就会大于200英镑。此后在对乘数理论进行进一步完善后，凯恩斯便运用乘数思想为扩大公共工程支出政策辩护，积极向全世界推广这种政策。

凯恩斯认为，增加资本的关键是增加有效需求，而这需要依靠大量、稳定的就业。失业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对企业生产产品的需求不断减少，导致资本家不再增加投资，而引发就业减少，造成工人失业。因此，他惊呼由“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魔鬼”比“人口过剩魔鬼”更加厉害，更难控制。在1930年12月发表的《货币论》中，凯恩斯用一个香蕉寓言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储蓄恒等于投资的传统观念，分析了因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衰退的发生过程：在一个只生产香蕉的封闭国家中，香蕉生产者通过生产香蕉产品并以一定价格出售，从中获得利润并付给工人工资。随着储蓄的增加，对香蕉的需求减少，香蕉价格开始下跌，香蕉生产者不断减少投资，造成失业不断增加，经济日益萎缩直至整个国家崩溃。通过这一寓言，凯恩斯阐明投资支配储蓄，而非储蓄支配投资，投资而非储蓄才是经济繁荣的关键，因而他最支持通过多投资少储蓄以提高有效需求而战胜萧条的方法。《货币论》是凯恩斯在考察投资、储蓄、利率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对《货币改革论》一书中货币数量论部分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对自己先前的理论加以总结的成果，该书对影响物价波动的各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分析。在该书中，他建议实行银行体系的货币金融管理，操纵并调节利率去影响投资率，使投资与储蓄相等，并保持稳定，从而达到价格稳定与经济均衡的战略目的。此时的凯恩斯，尚未摆脱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

1933年初，凯恩斯将自己撰写的《通向繁荣之路》送给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在该书中，凯恩斯运用“乘数效应”和“信心工具”，对以平衡预算为要旨、主张削减公共支出的一些英国财政部官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并廓清了以政府支出为主要手段进行反商业周期干预的最后障碍。凯恩斯指出，在一个萧条的经济前景低迷的年代，面对遥不可测的需求，很难想象私人部门会主动进行投资。而政府支出则可以创造这宝贵的需求，启动一系列的投资。此外，与减税不同，政府支出除了创造第一轮需求外，老百姓从政府支出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创造第二轮需求，从而形成著名的“乘数效应”。而减税创造出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会被分流到储蓄中，而经济越低迷，人们的储蓄意愿就越强，因而减税无法达到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同样的“失灵”也适用于降息，廉价的货币无法温暖

人们低到冰点的投资和消费愿望。因此，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已经失去了作用，财政政策应扮演主要角色。《通向繁荣之路》有效地解决了在反击萧条这场战争中钱从哪里来、怎么花以及如何发挥最佳效用的问题，为美国经济走出前任总统胡佛的货币主义泥淖提供了推手，铺就了美国的新政之路。

但尽管强调政府在经济危机中应扮演积极角色，凯恩斯亦反对过于扩大政府权力，导致集权政治的结果。凯恩斯致力于拯救自由社会而不是摧毁它，他大力提倡政府支出是为了创造反商业周期的需求，从而为市场机制重新发挥作用奠定基础。他不能忍受坐等市场机制慢慢恢复效用，但更无法忍受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市场机制。他对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罗斯福新政期间强力推动通过了“国家复兴总署法案”（NRA），该法案赋予复兴总署过多的权力，使其看上去像是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机关。1933年12月31日，凯恩斯《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上刊发。在信中，凯恩斯敦促罗斯福将NRA束之高阁，他将NRA称之为一个“戴着复兴假面具而实质上也许会阻碍复兴”的机构，罗斯福应该致力于促进公众消费和开放市场操作。

打破传统的微观分析方法，转而进行宏观总量研究，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另外一个关键转折。经济萧条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促使凯恩斯认为传统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对个量经济是适用的，如削减工资、裁员等措施，一个企业这样做会产生价格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如果普遍应用，就会造成社会总购买力的下降，导致更严重的萧条。“每个雇主只看到他自己实行削减工资的好处，但低估他的顾客收入减少的结果，以及竞争对手也削减工资的结果。”在1931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凯恩斯提到：“每个个体受理论上的亏损或盈利驱使，所做的恰恰违反了全体利益的期望。”

正是由于大萧条暴露了市场机制的失灵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失败，传统经济学破产，加速了凯恩斯摒弃传统思想、形成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进程。1932至1933年，他在吸收其他经济学家对《货币论》的批评意见的基础上，围绕失业问题对过去的理论思想进行了整合，逐渐形成了以调节产出和就业为中心的《货币通论》思想。而且由于现实严峻的失业问题使凯恩斯意识到传统的长期分析方法的缺陷，转而注重短期分析，关注决定当前就业量的因素，尤其是决定今年或明年就业量的因素。1932年10月，凯恩斯将其在剑桥大学授课的题目从“纯货币理论”改为“生产的货币理论”，后来在《货币通论》中渐次展开，并逐渐得以更清晰地阐述。后来，凯恩斯的批判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回忆说：“与此前凄凉的画面（传统经济学派自由放任的解决方法）形成对比，关于凯恩斯对萧条和正确治理政策进行解析的新闻从剑桥传播开来，这必然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它提供了一种对疾病极乐观的诊断。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更为直接、更少痛苦和更加有效的预算赤字形式的治疗方法。”

1936年，《货币通论》正式出版，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完整地呈现了出来，给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资本主义世界指出了一条摆脱经济萧条的道路。该书一问世，即迅速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轰动，在那些最年轻和最睿智的人群中

广为流传，他们把对此前传统经济学派的顶礼膜拜毫不犹豫地转赠给凯恩斯。一些经济学家将之称为经济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并把《货币通论》与斯密的《国富论》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史上三部同样伟大的著作。

三、《货币通论》的主要思想和阅读难点

与传统经济学不同，《货币通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调节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而通常出现的是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凯恩斯认为，不是供给决定需求，而是需求创造供给，这被部分西方学者称为“凯恩斯定律”。有效需求理论是《货币通论》的核心内容，有效需求指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考察的是社会的总需求。有效需求决定社会的就业量和产量水平，而有效需求的直接决定因素是消费和投资，正是由于私人投资和消费的不足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危机和失业。在凯恩斯看来，社会总的有效需求不足可归因为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一是边际消费倾向（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所增加的消费金额）递减，即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其结果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二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即人们增加投资时预计可以得到的利润率是递减的，这种心理作用往往使资本家对未来缺乏信心，从而引起投资需求不足；三是人们“心理上的流动偏好”，指人们总喜欢把一定量的货币保存在手边，以应付交易、各种意外和投机的需要。

凯恩斯指出，在公众心理给定的情况下，就业水平总体上取决于投资量。正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等这些心理因素的作用，导致有效需求经常不足，一般总会有“非自愿性失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的总需求恒等于总供给的教条。凯恩斯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总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萧条和失业。在经济萧条阶段，降低利率有助于经济复苏，但仅靠货币政策的被动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财政手段；政府要采取果断措施，实行收入再分配，提高消费倾向；由于心理预期的不确定，政府必须管理和控制当前的投资总量，由此弥补社会消费支出和总投资支出的不足，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

以上即是《货币通论》的基本思想。凯恩斯撰写本书的目的在于反对传统学者所信奉的传统就业理论（主要涵盖由劳动市场论、利息论和旧货币数量论），诊断危机和失业的根源，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付危机的态度，并提出其解决危机的对策。这也是本书被定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原因。

从现在的角度，这些看似简单的思想，在当时却充满了离经叛道，这也是《货币通论》被称为“凯恩斯革命”的原因。它与传统经济学的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否定了传统经济学信奉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不存在经济危机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并不总能达到充分就业，并明确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及严重破坏性；第二，摒弃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经济危机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而恢复均衡，坚决主张政府干预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第三，否定了传统经济学

在经济危机病因探索方面的“外因论”，转而寻找不稳定的内在结构，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原因，创立了有效需求原理及三大心理定律；第四，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入及其变动的的原因，以区别于单个商品、单个厂商和单个消费家庭之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第五，摒弃了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原则，主张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主张扩大政府开支、赤字预算和举债支出，这样既可以直接扩大政府投资，也可以带动私人投资，产生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产量和收入的预期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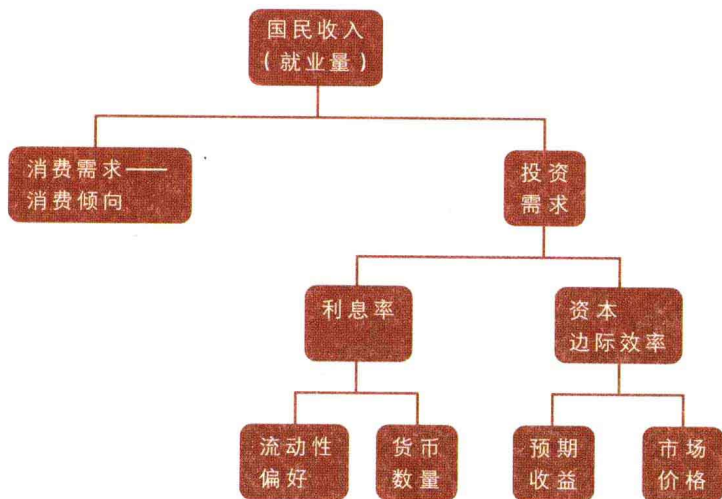
但也应看到，《货币通论》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存在一定的继承。凯恩斯没有否定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微观基础，也没有否定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只是把传统经济理论的有效性限定在了充分就业均衡条件下。他希望通过政府财政政策干预，弥补市场失灵和缺陷，以保证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充分就业。而当实现充分就业时，则应转而抑制公共支出。正如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曾荣膺197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言，在马歇尔和凯恩斯之间不但不存在矛盾之处，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前者研究经济社会的微观现象，后者说明宏观经济方面波动的原因，并提供消除波动的对策。换言之，只要凯恩斯的对策能把就业量或国民收入的波动消除，马歇尔的自由资本主义便会实现。在此后凯恩斯学派的思想演变过程中，经济是否具有强大的自我矫正机制成为凯恩斯主义者与古典经济学家争论的核心，即能否通过灵活的价格和工资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古典主义学说一般强调长期经济增长，主张放弃稳定商业周期的政策。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主张通过适当的货币财政政策调控商业周期，以稳定经济增长。

然而《货币通论》并不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即便是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开始阅读时看不懂《货币通论》，甚至认为“在该书出版后的约一年到一年半期间，在麻省、剑桥都没有任何其他其他人真正知道该书的内容是什么”。《货币通论》之所以难懂，除“本书主要是面向经济学家们而作”（凯恩斯语）的原因外，其写作风格比较晦涩、艰深，甚至让一些经济学专业人士也望而却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书是为上世纪30年代的西方职业经济学者所写，因此一些知识被默认是必备的。包括“萨伊定律”和西方经济学中传统的劳动市场论、利息论和旧货币数量论。在《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引用了马歇尔、庇古、马尔萨斯、费雪等传统经济学家的众多观点，他假设读者阅读《货币通论》时对这些人的理论非常熟悉，因而往往很简略地描述。这对一般读者来说，如果不清楚了解此前的这些理论，在理解《货币通论》时便难免存有诸多费解的问题。而大量使用且未进行详细推导的数学公式，也给一般读者的阅读造成了障碍。

第二，凯恩斯对自己提出的新理论体系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框架，容易产生逻辑整合上的迷惑。萨缪尔森指出，《货币通论》中，“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没有被明确地表示出来，好像凯恩斯没有认识到体系的存在，而在涉及该体系与旧体系之间的关系时，他的论述特别不清楚。”而尽管凯恩斯撰写《货币通论》的最

终目的在于提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对策，然而，凯恩斯在本书中却没有对此加以系统地论述，而是以支离破碎的形式散见于全书之中。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教授（1998年）从《货币通论》中精练出了一个理论框架，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凯恩斯的理论体系。



《货币通论》的理论框架

该框架显示，凯恩斯期望通过提高国民收入，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以便解决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首先在理论上说明国民收入由哪些变量决定，而在找出这些变量之后，企图用国家的政策来控制这些变量，最终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凯恩斯认为，国民收入系由消费和投资两部分组成。因此，前者数值的高低取决于后者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数值的高低。按凯恩斯的意见，消费的数值又取决于消费倾向；投资的数量则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在这里，资本边际效率又取决于预期收益和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而利息率则由货币数量和流动性偏好所决定。

第三，凯恩斯随意性的写作风格导致《货币通论》中存在众多容易混淆的地方，让读者难以理解。萨缪尔森在《论〈货币通论〉》中写道：该书“具有大量的故弄玄虚或令人混淆之处”。如《货币通论》中所说的投资与储蓄相等。根据凯恩斯的定义：

收入 = 产量的价值 = 消费 + 投资

储蓄 = 收入 - 消费

因此，储蓄 = 投资

这三个公式显示，凯恩斯把“储蓄恒等于投资”作为一个定义提出。然而，《货币通论》全书都在说明：由于投资未必能等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所以资本主义才出现危机和失业问题。这样，储蓄又可不等于投资。因此《货币通论》出

版以后，关于二者是否相等，西方经济学界莫衷一是。最终的定论是：二者时刻相等是指事后的或统计数字的相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事前的或意愿的储蓄和投资的相等。事实上，正是由于事前的或意愿的储蓄和投资不等，才导致了不同国民收入水平上的事后或统计数字的储蓄和投资相等。这种解释尽管有可能反映了凯恩斯的本意，但凯恩斯自己却未对此加以说明（高鸿业，1998年）。

因为《货币通论》存在以上特点，增加了阅读本书的难度。上文介绍了凯恩斯的思想演变过程，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本书的理论。下面对于本书每部分的内容作以概括，为读者勾勒出简单的框架。

四、各卷导读

《货币通论》全书包含一个简短的原序，主体部分由六卷共二十三章组成。在原序中，凯恩斯主要阐述了写作《货币通论》的目的，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该书出版的动机。凯恩斯开宗明义：“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对理论的严重质疑，其次才涉及这些理论的具体应用。”即本书的撰写主要目的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理论。而把理论的应用放在次要位置，大概也可以解释上文提及的本书中并未系统分析解决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对策。第一卷含两个章节，阐述了“通”字的内涵、传统经济学以及本书的有效需求原则等。第二卷分四章，界定了三个疑难问题：如何确定衡量单位？如何确定预期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如何给收入下定义？为后文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的三章组成了第三卷，详细阐述了消费倾向理论、影响消费倾向的主客观因素以及乘数问题。第四卷为“投资诱导”，分八章，主要阐述了资本边际效率的含义、流动性偏好理论以及决定投资的因素。第五卷包含三章，对货币工资和物价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工资与物价的决定因素。最后的三章构成了第六卷，对一些争论进行了答复，并廓清了几个问题。

第一卷 导论

在这一卷中，凯恩斯总结了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并提出了自己的有效需求原理。他把就业理论放在第一位，而利息理论和货币理论构成就业理论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古典就业理论假设的前提只是一个特殊状态，因而不能适用于一般情形。他强调本书书名中的“通”字，认为本书中的就业论既适用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也适用于非充分就业的事例，所以是一般理论，即“通论”。

凯恩斯指出，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上：一是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二是对于既定的就业量，实际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凯恩斯对古典学派的第二个前提提出了批判，指出第二个前提源于这样一个理念：劳动者的真实工资取决于劳动者和企业家双方进行的工资谈判，则劳动者能决定其自身的实际工资。但在劳动市场上，劳动者所要求的只能是货币工资，则对于劳动者整体而言，可能无法使得货币工资一般水平的